

谢向荣秉承其师的学术风格,通过对《周易》大畜卦上九爻辞“何天之衢”十五家训解的综合考察,认为:“诸家所解,多有可疑之处。惟郑玄释‘何’为‘荷’,以‘天’为上天之天,又释‘衢’为道路,所论既合《象传》及其他文献所载,又无背大畜全卦之卦象及语法问题,于理至顺。”

台湾政治大学的吕凯对郑玄注纬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郑玄注纬,后人短之者,实执偏之见也;而能深体郑玄注纬之意者,学问之道也。”四川大学舒大刚回顾了自南朝梁以来,学界关于郑玄《孝经注》的真伪的讨论,认为:“从前关于《孝经郑注》的种种怀疑,甚至诬蔑不实之辞,俱可休矣。”聊城大学唐明贵考察了郑玄《论语注》的成书、流传和辑佚,并总结了此书的特色,认为:郑玄《论语注》“以古学为宗”,注重对《论语》字词的释义注音,同时“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注重对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阐发,成为汇通今古学以诠释《论语》的代表作,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山东文登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初钊兴通过对正史和地方志中相关史料的钩稽,根据对遗址的实地考察,认为郑玄“客耕东莱”的时间为公元167—184年,具体地点为东莱郡昌阳县长学山。

本次大会的大部分论文都是首次发表,反映了郑玄研究的最新动态。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杨敦雷)

“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永宣时代及其影响”综述

“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于2010年11月18至19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是为贯彻2009年年初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成功互访所达成的合作交流项目而召开的,也是继2009年10月“两岸故宫首届学术研讨会——为君难:清世宗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两岸故宫学术研讨会。出席本次会议的50余名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研究院以及相关高校。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2篇,内容涉及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政治、艺术、文化、外交、经济等诸多领域的热点问题,从博物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1. 在明史专题研讨中,代表们依据各自掌握的历史文献,围绕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政治、文化、宫廷礼仪变化的原因及其特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毛佩琦《洪武的政治遗产和建文永乐的对策》指出,建文帝、永乐帝对洪武时期的分封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变通,永乐开始的内阁继承了洪武废除丞相的制度,并对明清以降内阁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商传《恢弘时代——永乐朝的政治与文化》提出了永乐“官文化”的概念。他论述了这种由官方组织完成,由高级官吏推动的带有官方意味的官文化的特点和对于当今的借鉴意义。王鸿泰《帝国气象:明文皇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从帝国气象与经营规模、礼乐之治与圣王传统、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三个方面,说明永乐时期文化对政治统合的追求。王熹《永乐时期宫廷礼仪的变化与帝后生活的特点》认为永乐时期在宫廷礼仪方面的许多创新

制度在明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从人性角度探讨了明初宫廷礼仪变化的原因及其特点,帝后家庭生活与宫廷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朱棣的性情好尚对宫廷生活的影响等问题。朱鸿《鉴宣和之迷惑——明宣宗的艺术志趣与成就》以宣德帝赏赐重臣杨士奇画作《寿星图》的题记为切入点,阐述宣德皇帝借画言志的思想。谢贵安《明宣宗皇帝的宫廷娱乐生活述论》在历数朱瞻基种种娱乐活动的基础上,肯定了他的娱乐生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赵中男《从永乐到宣德:宫廷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因初探》归纳了宣德时期比永乐时期宫廷文化有所发展的六个特点,并着重谈了促成这种发展的五个宏观因素和七个具体因素。万明《整体丝绸之路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指出,郑和下西洋促成了著名的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将中华文明与丝绸之路广大地域内的诸文明连接起来,对文明的融合与贯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燮平《明永乐朝紫禁城的规划与营建》对于南京、凤阳、北京三处都城的营建概况作了介绍,指出了北京紫禁城的大致特点。林士铉《内阁大库档满文本明太宗实录稿译注及其相关问题》以具体事例对台北故宫藏满文本《明实录》编译背景作了详细介绍,论证了满文本《明实录》译注的实用性和特点。卢雪燕《明彩绘本〈甘肃地方图〉考》介绍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甘肃地方图》的源流和主要内容,详尽考证了该图的年代,评价了其对于明史研究的价值。

2. 在永宣瓷器专题研讨中,代表们围绕国外博物馆收藏中国瓷器等情况,永宣御窑瓷器的时代特点及艺术成就,永宣御窑瓷器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永宣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永宣时期具体文物名称的定名、功用、造型渊源及对后世影响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霍吉淑《革新和地方主义:永宣时期的陶瓷、漆器、金属器》介绍了位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和其他博物馆对中国明代永宣时期瓷器、漆器、金属器等收藏和来源情况。吕成龙《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概述》指出明代永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御用瓷器完全摆脱了元代瓷器风格的影响,开创了以器物大小适中、胎体厚薄适度、装饰纹样疏朗、文人气息浓郁等为特点的新风貌。耿宝昌《实践得真知:永乐黑、白釉瓷》介绍了长期以来人们在对永乐单色釉、无当尊、“内府”款梅瓶、釉里红梅瓶、青花壮罐、青花压手杯等的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问题。廖宝秀《永宣莲子碗茶盅及其相关问题》从一类具体器物为着眼点,通过对民国初年《故宫文物典查报告》的详细梳理,明确回答了莲子碗这类器物的定名和功用问题。王光尧《再论“御窑厂”的建立时间——明代御窑遗址的考古学分期》、权奎山《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御窑烧成工艺》等则通过对明代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所获得实物对御窑瓷器款识、落选品处理方式、窑炉形态与分布情况等诸多对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所见的考古现象进行分析,阐述了明初御窑的烧成工艺、御器厂的始建时间及其职能。杰西卡·罗森《15世纪伊朗艺术的中国化》、弓场纪知《明前期青花瓷器向伊斯兰世界的输出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模仿》、王健华《试论郑和下西洋对永宣青花瓷器的影响》、冯小琦《永乐宣德瓷器的外来因素》等,以陶瓷研究的视角,从永宣青花瓷器造型、纹饰、所用青料、烧造数量等方面,探讨了当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陶瓷艺术等领域发生互动影响的历史事实。

3. 在明代工艺美术史、工艺类器物的专题研讨中,代表们既有对永宣时期诸种器物进行的综合论述,也有对某一具体类别研究的详细探究。

杨伯达《明永宣时期皇家工艺概要》从宏观层面向大家介绍了包括瓷器、织绣、漆器、玉

器、金属、玻璃、掐丝珐琅、竹木雕刻、犀角等在内的明初工艺品的风格和特色。蔡玫芬《明初官样器物的讨论》则通过对传世明初多种工艺的样式类型进行归纳,从文献中寻找官样的内涵、功能和官样制作的核准流程等,阐述了明初工官制度下器物的生产情况。漆器是明代永、宣时期的重要工艺品之一。关于漆器,代表们围绕明代永、宣漆器的时代风格、款识特点及其在中国漆器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否存在北京官营作坊“果园厂”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陈慧霞《不存在的空白期——明“永乐剔红”花卉纹漆器风格试析》、张丽《再议宣德漆器》、西冈康宏《关于永乐、宣德时期宫廷雕漆器的特征及问题》分别探讨了高质量的永乐剔红漆器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其风格延续的时间和变化。她们指出,永乐、宣德两朝漆器的各自风格都有年代的差异,永宣剔红漆器上所署“大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款有真伪之分。永乐时期宫廷用漆器很可能是由朝廷下令在元代漆器制作中心的江苏地区订制的,而不是在通常所说的北京官营作坊“果园厂”制作的。宣德时期的漆器制造,实则是漆器发展史上一个转变期,既有由盛至衰的变化,也有艺术风格上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宣德炉”是否存在的问题颇有争议。陆鹏亮《宣炉流变考》通过文献分析,阐述了“宣德炉”的演进历程。李米佳《清宫旧藏“宣铜”器释疑》则通过实物,从器物的式样、款识、皮色三方面对现存清宫旧藏的“宣德炉”器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宣铜”的称谓更加适宜。另外,徐琳《明早期礼制用玉探讨》参考明代早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器物,结合带有明确款识的瓷器、漆器等文物,归纳出这一时期玉器制作的风格和工艺特点。林欢《明代“龙香”墨考》认为“龙香”墨在明代达到了制作技术的最高峰,它在明朝的继续盛行兼具政治舆论导向和成份构成两种意义。

4. 在明代书画史和书画类文物的专题研讨中,代表们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明代永宣时期的台阁体书法产生的原因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宫廷文化娱乐生活的特点、宫廷绘画风格的转变、吴门画派的渊源等。

肖燕翼《明代的台阁体书法》对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书家中书舍人的身份给予了考证,分析了台阁体书法产生的原因,并着重指出,历史上对台阁体书法贬多于褒的评论并不完全准确、恰当,因为这种应规入矩、和谐婉美的书法作品,仍会给人们的视觉带来美的享受,故应在书法史上给予一席之地。单国强《永宣时代宫廷绘画的转捩》通过对永宣两朝宫廷绘画的比较,得出宣德朝宫廷绘画无论从机构设置、奖惩制度还是画家创作等方面,都已由永乐朝的复苏或初创转变为昌兴或繁盛局面的结论,而且认为这一兴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时期。单国霖《论吴门画派先驱画家》介绍了明代洪武至天顺年间江南地区出现的一批追踪元代文人画风的画家,他们上承元代文人画传统,下启吴门画派的风气,是吴门画派的先驱。这些画家为吴门画派这一文人画新潮流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林莉娜《游艺与玩物——明宣宗行乐图及其御笔戏写画之研究》以具体的画作论证了明宣宗对于娱乐生活的喜好和明初宫廷文化娱乐生活之丰富多彩。

5. 在明代民族关系史、宗教史类专题研讨中,代表们围绕永乐年间出版的佛教经典编排之旨趣、人物活动、造像的艺术成就及分期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胡进杉《明永乐间写本〈大乘经咒〉内容之研究》重点考证了台北故宫藏《大乘经咒》的抄写年代、该书与《明人书内府金藏经》的比较、台北故宫藏《大乘经咒》的内容、朱棣编辑该书的旨趣等问题。陈楠《明宣德年间大慈法王在北京活动详考》详尽考述了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

宣德年间应朱瞻基邀请到北京后驻锡大慈恩寺以及其他活动情况,考证了大慈法王参与助缘修建北京法海寺及主持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的茶毗法会等宗教活动,以及大慈法王圆寂的时间、地点等问题。王家鹏《论永乐宣德佛像艺术成就》分析了永宣时期佛像造像样式来源于汉藏两种文化的设计理念,阐述其精湛的成型工艺和传播影响。胡国强《明代初期宫廷造像分期》通过对北京故宫藏32件署有“大明永乐年施”的佛造像进行排比分析和科技检测,判定了永乐佛造像藏品的三个历史分期。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院庆85周年和明代紫禁城落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于2010年9月26日至12月26日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长久以来,故宫展览以清宫展览为特色,而此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首次将明代文物作为院内展览的重点。为配合此次展览,“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也随即召开,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两岸故宫每年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在大陆尚属首次,与会代表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博物馆界和明史界的专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形式,对于中国历史某段时期各方面问题的研究具有范例作用,因而深受两方面学界代表的欢迎。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 林欢)

“赣州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三十一届年会”综述

“赣州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三十一届年会”于2010年10月15—17日在江西赣州召开,会议由赣南师范学院承办。会议共提交论文九十余篇,分赣州及江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今介绍如下。

大多数学者以赣南及江西相关研究作为选题。首先,赣州城的历史和文化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韩振飞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简明阐述了赣州的发展历史。梁艳从古地名的分析讨论入手,揭示了宋城赣州浓郁的商业文化氛围。袁彦、常青以水与赣州及其人民的互动为核心,探讨了宋城赣州丰富的城市水文化。刘灯明从赣州通天岩铸钱摩崖石刻说起,认为宋代赣州铸钱业发达,在宋代铸钱业占有重要地位。张嗣介再现了明末清初赣州抗清史实,指出战争对人口和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清代早期闽粤客家人返迁或迁徙赣南移民潮出现的主因。杨恒平考察历代《赣州府志》纂修情况,并对现存旧志的因袭传承加以解读。窦秀艳认为明清以来流传的众多《埤雅》版本源于明初建文帝时期江西赣州府刻本,并述及明代赣州刊刻该书及其流变情况。郭天祥考订了赣州文化名人钟绍京的卒年,以及他在参与李隆基诛杀韦氏前后所任职官问题。李云彪对苏轼两度经过赣州的史实加以考述,并对其当时心境有所分析。温春香认为经过书写和流传,文化史视野下的郁孤台逐渐成为文人家国之思的符号,远迈于一般景观。王忠强认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通篇展现了作者忧国爱民